

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交游 及对传教的主张

李志刚

一、引论

郑观应17岁从中山到上海“学贾”，其后任英商宝顺洋行、太古洋行的买办。37岁为北洋大臣李鸿章札委津沪电报局总办，并在上海创设机器织布局、造纸局、船坞、开垦公司、壕利公司等实业。至39岁李鸿章札委为轮招商局会办；45岁为开平矿务粤局总；56岁任汉阳铁厂总办；66岁任粤汉铁路总办。①郑观应先于1869年捐官“员外郎”；1870年捐官“郎中”；1879年捐官“道员”。②郑观应曾先后两度从政，即1884年在广东接受粤督张树声差委；继受兵部尚书彭玉麟委派到南洋了解各地政情。1903年为广西巡抚王之春委任为左江道职，为时不到四个月。③郑观应主要的著述有《救时揭要》、《易言》、《盛世危言》、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等。其中以《盛世危言》为郑观应思想的代表作，自1894年出版至1921年有续编、增订新编、补编、全编、统编增订正续、首编、二编、三编、后编等，共21个版本，④是晚清著名时政论著。就郑观应一生事业和著述所见，自不同角度的理解，可称之为买办、实业家、思想家、改良主义者、政论家、诗文家。但总结而言，郑观应可以说具有“绅商”的角色，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不少贡献。

有关近代“绅商”的形成，在《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》一书，提及是晚清社会转型所致，而其中归纳有士人型绅商、买办型绅商、官僚型绅商三款。所谓士人型绅商，即以传统儒家士人与商人的结合，亦即一介商人，而具儒者的风范，以“状元资本家”张謇和经元道作为例证。有说

买办型绅商，是处于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不可缺少媒介；同时亦是沟通洋商与政府官吏的媒介，而多数买办透过出资捐纳官衔的渠道达到“绅化”，以唐廷枢、徐润、容闳为代表。至于官僚型绅商，即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各级政府官吏，他们的身份和职业是官员，是以官兼商的绅商，盛宣怀、周学熙是为代表。⑤但该书则以郑观应与张謇同属士人型绅商，有谓：

尤其对于郑观应这种曾接受过系统儒家教育的绅商，在很多时候，商与绅的内在气质，往往超过买办职业所能施予的影响。青年时代的郑观应就是这样一面操著为士大夫不屑不顾的买办职业，一面以士大夫的眼光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。郑观应曾追忆他写《易言》的初衷：“庚申之变，目击时艰，凡属臣民，无不毗裂”，于是“每于酒酣耳热之下，闻可以安内攘外者，感触于怀，随笔札记，历年既久，积若干篇”。就其对亡国灭种的忧虑之心而言，郑观应与张謇等士人型绅商并无二致，甚至愤慨到了“毗裂”程度。但买办生涯所赋予他的眼光和知识，又使他能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，形成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思想更为接近的见解和主张，更直接地反映普通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。⑥

郑观应之能“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，形成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思想更为接近的见解和主张”，显然与他在上海活动，以及所接触思想家有所影响和启发。尤其他所处的年代，中外基督教人在上海经已带来新的思潮，激发士绅、官绅、商绅对时局的认识，探求各种救国的

方策。

二、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交游及所受影响

郑观应任职洋行买办,经营洋务,以及各种西方实业,与中外人士接触甚多,其中属于基督教徒亦属不少。然而本文只就傅兰雅、李提摩太、王韬、容闳、伍廷芳、何启、孙中山作为引介,使能了解郑观应在交游上所产生的思想的反响。

1. 郑观应与傅兰雅之交游:傅兰雅(John Fryer 1839-1928)英国传教士,于1861年抵香港任圣保罗书院院长;1863年应聘北京同文馆;1865年转赴上海任教英华书院,后转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译,由傅兰雅主持西书翻译不下345部,包括法学、医学、冶金、化学、工程、贸易、政治、地理、古文、动物、植物、印刷、摄影、军事、海防、工艺、科学各类书籍。尤其是1875年主编的《格致汇编》,可以说是引介西方科学最早的报刊。直至1896年赴美国,出任加州柏克莱大学汉学教授。^⑦郑观应于1868年就读傅兰雅所办的英华学馆夜读班,历有两年,并“究心泰西政治、实业之学”。^⑧傅兰雅主持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,主译各类西学、西政、西艺的书籍,对郑观应思想定有影响启发。

2. 郑观应与李提摩太之交游:李提摩太牧师(Rev. Timothy Richard, 1854-1919)是英国浸信会教士,1870年抵上海,后转往烟台传教,1886年任“天津时报”主笔,其后因在山东、山西赈灾成绩卓越,为中国官员敬重。1891年任上海广学会总办,提倡公开演讲,引致中国各地有“学会”的创立,^⑨《万国公报》风行一时,而所著《泰西新史揽要》,成为知识分子喜欢阅读的专书,亦曾献呈光绪皇帝御览。李提摩太提改革变法,而《万国公报》所表达的新言论,已成为鼓吹变法的必读。郑观应《盛世危言》是深受李提摩太言论的影响,郑观应曾有《读泰西新史感言》:

专制重愚黔,愚黔如自缚。自缚手足乖,国势焉不弱。国弱被人欺,大权日旁落。共和欲民智,民智多材略。材多国富强,朝野欢声作。上下悉同心,何畏强权恶。唤醒梦中人,鼾睡当早觉。立宪自文明,倾颓因暴虐。优胜劣必败,聚散由厚薄。普告秉钩人,刻意求民瘼。^⑩

3. 郑观应与王韬之交游:王韬(1828-1897)

秀才出身,富有文才,1849年入上海伦敦传道会墨海书馆从事圣经编译工作,深得麦都思牧师(Rev. Walter Henry Medhurst)器重。1862年因上书太平军献策,为清政府通缉,幸得麦都思牧师儿子麦华佗(Walter Henry Medhurst)任上海英国总领事,助往香港避难,从事理雅各牧师(Rev. James Legge)中国经典翻译工作。1867年至1870年应理雅各邀请,赴苏格兰助译《易经》。途经埃及、意大利、法国马赛、里昂、巴黎、英国。其后游英国伦敦、牛津、阿巴丁、爱丁堡各城,见闻益广。^⑪

王韬所接触西方传教士,外交官员和汉学家,使他对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多有启导。及至于1873年在港与黄胜接收英华书院印务所的印刷机器、铜模铸字机和铅字粒,在港创办《循环日报》,王韬任主笔发表西游见闻,以及个人政论主张,提倡政治改革,故名声远播国内,为知识分子所敬重。郑观应《易言》是由王韬主办的“中华印务总局”排印,该书署名为杞忧生,由王韬撰写《序》和《跋》,可见郑观应对王韬的敬重,王韬对郑观应《易言》至甚感佩,有说:

《易言》一书,乃杞忧生盱衡时事,思挽时局,幽愁积愤之所为所作也。凡目有所触,耳有所闻,默识于心而深思其故,一旦恍然有得,因揭其要,以质于世。其词畅不繁,其曰显而不晦,揭事陈直而无隐,同条其贯切而不浮,直措诸世而有济,施诸今而可行者欤,其曰易言者,谦词也。尝从七千里外邮筒寄示,余未读终卷,而叹杞忧子为今之有心人也。^⑫

郑观应与王韬可谓志道相投,及至王韬1883年返上海定居两人交往更为密切。当王韬出任《格致书院》掌院,于1893年(癸巳年)请郑观应为格致书院冬季课命题三道;1894年(甲午年)冬季课命题四道。^⑬同年孙中山在上海亦由郑观应介绍认识王韬,^⑭是见两人关系密切,对时代问题作出思考。

4. 郑观应与容闳之交游:容闳(1828-1912),中山人,少时入读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。1842年迁校香港,至1847年由校长鲍留云牧师(Rev. Samuel Robbins Brown)带同容闳、黄胜、黄宽三人赴美入读中学,而容闳于1854年毕业耶鲁大学,成为中国首位留美大学毕业生。容闳回国后,曾在上海任职宝顺洋行买办。1863年受曾国藩委派赴美采购机器,为筹建江南制造局。容闳回国后向曾国藩、丁日昌献议遣派幼童赴美留学。其后奏准,自1872

年至1875年,每年派出30名幼童赴美入读美国新英格兰各地中小学,藉此推中国教育现代化,为国家培养时务人才,至1881年因旧派反对,将全部留学生撤回中国,但容闳确是一位推行教育现代化重要的人物。^⑮

郑观应和容闳同属香山本乡,对容闳必有认识。按郑观应是于1859年由徐润和曾寄圃介绍入宝顺洋行工作,^⑯而容闳亦于同年由曾寄圃入宝顺洋行任职,从事产茶区调查工作。^⑰1880年郑观应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之时,曾委托在美任职驻美副公使和驻洋肄业局副总监的容闳,在美聘请有织布历练的工程师,到上海商办织布局工作。^⑱1881年当容闳带领幼童黯然归国后,郑观应赠诗表以惋惜,可见两人交情甚深。诗云:

采采芙蓉涉远江,中西学贯始无双。

应嗟匡济稀同志,却羡利名隶美邦。

鹏运八紘风在下,龙文百斛鼎能扛。

诸生海外将成曲,底事吴儿换别腔。^⑲

5. 郑观应与伍廷芳的交游:伍廷芳(1842-1922),广东新会人,1861年毕业香港圣保罗书院,随后在香港巡理署任译员。1874年“以为欲救国危,非赴欧美精研法学。举吾国典章制度之不适者,改弦而更张之不可”,^⑳入英国林肯法学院学法律,1877年毕业返港,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大律师。至1882年被李鸿章委为北洋洋务局委员,历任驻美国、秘鲁、墨西哥、古巴等国的公使。辛亥革命起义各省推为外交总代表,中国民国临时政府成立,任司法总长。1916年黎元洪委为外交总长,翌年代国务总理,因反对黎元洪解散国会,伍廷芳参加孙中山护法政府,任外交部长,1922年被孙中山任为广东省省长,同年病逝。^㉑郑观应与伍廷芳年岁相若,同属广府籍,私交甚笃。从郑观应给伍廷芳的书信中,两人讨论内容至为广阔,除宗教问题之外,多属国事和时事,郑观应多有献策,如何以云裁兵?何以云开专门学校?何以云练民兵?何以云僻边界?又以郑观应最反对外人充当海关总税务司与丧失外法权无异,故请伍廷芳在法国巴黎和平会议中提出反对。当伍廷芳反对黎元洪辞国务总理职,转投孙中山阵营,郑观应表示支持并写诗表示祝贺。^㉒

6. 郑观应与何启的交游:何启(1859-1917),在香港出生,是首位华人牧师何福堂第四子。何启在香港皇仁书院肄业,后转英国完成中学,升读鸭巴甸大学学习医,毕业后再转读其姐夫伍廷芳

所毕业的林肯法律学院学习法律。其后雅丽氏(Alice)结婚,回港后操律师业务。夫人返港不久病逝,何启为纪念亡妻,捐资兴建雅丽氏医院,于1877年落成。^㉓以雅丽氏医院所在另开设香港西医书院,同年孙中山就读该校。同年何启发表《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》,以此驳斥曾纪泽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的不是,曾纪泽所提不外巩固船坚炮利的防务,忽略政治改革,而何启所著重是政令的公平,和法律的执行。其后何启和胡礼垣有不少论著,编为《新政真铨》,提倡政治的改革,成为当时著名改革言论。^㉔郑观应对何启的观念极为赞同,题何沃生胡翼南《新政真铨》诗中有云:^㉕

古言廉不明,貽祸更酷烈,忠愤长太息,吾华宁遽屈。倚人终失算,须求自强策。急效俄彼德,变法求后杰。譬如披葛衣,岂可耐风雪。将相果得人,治道有本末。借才先练兵,饷是额无缺。民国仿泰西,志向同仇切。选匠广制造,器械除窃劣。更辟大书院,文武当循辙。省刑薄税欵,商律而早设。上无畛域分,人心方团结。富强从此肇,外侮自可绝。一篇新政书,抗议堪击节。郑观应所写,可说在阅读《新政真铨》后的一种心得,对何启和胡礼垣的主张极表赞同。

7. 郑观应与孙中山的交游:孙中山(1864-1925)与郑观应在年龄上虽有差距,但郑观应与孙中山的接触,显示他对革命事业的支持。沈渭滨在“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”一文,^㉖对孙中山于1894年与陆皓东到上海,为上书李鸿章事,引用陈少白《兴中会革命史要》;邹鲁《中国国民党史稿》;冯自由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的资料,证明郑观应曾为孙中山致函盛宣怀有谓:

敝邑有孙逸仙者,少年英俊,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,留心西学,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,欲游历法国谋求养蚕之法,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;招人开耕,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。其志不可谓不高;其说亦颇切近,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。兹欲此游津门,上书傅相,一白其胸中之素蕴。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,俾其叩谒台端,尚祈进而教之,则同深纫佩矣!^㉗

事实上,其后1900年策动李鸿章与孙中山谋两广独立,郑观应是有所了解;并于粤路公司于1906年发生风潮,革命党人帮助绅商,掀起倒郑风潮,是与革命多有关系。无疑郑观应是了解孙中山革

命,并且支持此次革命运动。^{②8}

三、郑观应对传教的主张

郑观应在思想学术著作上,以《易言》和《盛世危言》两书最具成就。《盛世危言》是《易言》的扩充,不少是修改的增订本。就夏东元编《郑观应集》上册,载有《易言》三十六篇本;《易言》二十篇本,和《盛世危言》。《盛世危言》的编载,以五卷本,十四卷本和八卷本为范围。

^{②9}郑观应在《易言》和《盛世危言》所论公法、税务、鸦片、商务、开矿、火车、电报、开垦、治罪、机器、船政、铸银、邮政、盐务、游历、议政、考试、吏治、边政、交涉、传教、出使、水师、火器、练兵、民团、治河、虚费、廉俸、书吏、招工、医道、犯人、栖流、借款、裹足、通使、贩奴、税则、国债、西学、狱囚、铁路、船政、道器、学校、女教、藏书、议院、公举、原昌、自强、日报、典札、旗籍、禁烟、条约、入籍、陶宦、限仕、汰冗、建都、户口、教养、训俗、刑法、巡捕、善举、僧道、盗工、厘损、停漕、度支、囤积、商战、商船、保险、修路、驿站、银行、圆法、纺织、技艺、赛会、农功、垦荒、旱潦、海防、边防、江防、炮台、练将、卫屯、间谍、弭兵等各目,^{③0}是有关国家经济、建设、国防、法制、外交、教育、社会、风俗、礼教、民生、选举、商务、政府、宗教、交通、医疗、机械、警政种种的建议。在晚清转变的时代,郑观应的论著,实在是满清推动洋务运动的时言,开拓士子的思维,此种富国强兵的主张,深得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。然而郑观应在撰写《易言》和《盛世危言》,对“传教”问题均有论述,这是晚清推行洋务运动,在提倡改革的言论中少有涉及。据夏东元所编的《易言》、《盛世危言》,各书的“传教”开宗明义有说:

1.窃谓外国传教士,实中国召募之由也。

(《易言》三十六篇本,1880年)^{③1}

2.呜呼!终必败中西和局,其惟传教乎!

(《易言》二十篇本,1881年)^{③2}

3.嗟乎!中西和局之不能长保者,其必阶于入内地传教乎!(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,1894年)^{③3}

4.嗟乎!中西和局之动多翻复,其必阶于内地传教乎!(《盛世危言》十四卷本,1895年)^{③4}

郑观应在此指出传教士及入内地传教是导至中西不和的原因。从四篇《论传教》内文所见,实质是以1880年《易言》三十六篇本为基础,其后各

篇因时代的变迁有所修改,随时势提出解决的办法。即如1880年《易言》有谓:

今欲中外相安,惟有会集万国公议妥商,劝令英国不贩烟,法不传教。至保护洋商之责,我中国自任之,以恪遵高庙怀柔远人之成宪。庶几联络一气中外一家,而各商可免教堂供养之繁,各口复可少减驻泊兵船之费。猜嫌悉泯,情好日隆,于中西之国计民生当不徒小补矣!^{③5}

1881年《易言》之解决办法:

诚欲彼此相安,必须善筹良法。夫入教之民,固尤是中国之民也,宜开列姓名,报明地方官,查无过犯之人,方准注册,照约保护。遇有事故,仍依华例惩办,准令教士听审。尚系现在犯案,及未报明注册者,概不作教民论。遇有过犯,径由地方官惩办,教士不得过问。外国教士所至之处,应归华官约束,有干预公事,挟诈侵权者,立即咨请该国公使,飭遣回国,以儆效尤。庶几猜嫌悉泯,情好日敦,外不致殃及西商,内不致贻尤宵旰,似与中西大局,尚亦有利哉。^{③6}

1894年《盛世危言》,提及民教相安,必须筹良法。遇有事故,依华例惩办,官吏亦不能因人入教遂分轻重,教士在华仍由华官约束,有侵权者,请该国公使遣回国。此则教民入教于利害无关,国家无所不容。^{③7}1895年《盛世危言》所载:

况入教这民,犹是中国食毛践土之民也,劝民为善,固圣朝宽大之政所允行也。若纵民为奸恶,倚教势以祸人,非摩西立诫之旨,教士传教之心,其心能克己爱人,颇近我儒家之流,亦有颇知读我孔孟之书者。吾人幸勿动相轻妄肆诋谇,反为外人笑其量之不广,致无端肇事,转贻君国之尤,则尤当鉴戒者也。^{③8}

郑观应对于传教观念,不在反教,而是解决民教相争的问题,特别指出教士和教民的错处,提出中外可行的办法,因此郑观应是采用积极性的方法,言及明朝徐光启未因入教受贬。^{③9}又谓林乐知、李提摩太、傅兰雅、艾约瑟、花之安等教士久在中国,常将中外利病之事著书救世,^{④0}甚得郑观应赞赏。事实上,在《盛世危言》一书,亦多载李提摩太后专论,显见郑观应在反对倚势凌人的教士、并非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。

四、结语

郑观应17岁入道;46岁求道于广东罗浮山,^{④1}历年发表有关道家思想论著不少。^{④2}一生为虔诚道教徒。他自在上海“学贾”以来,所接触的中外基

督教人确属不少,诸如傅兰雅、李提摩太、王韬、容闳、伍廷芳、何启、孙中山等思想家、宗教家、政论家、教育家、法学家,过从甚密,交情甚笃,其中对郑观应的思想亦多有影响,惟是在信仰上,仍然保持个人信念,未受影响因而转奉基督教。可见郑观应具有一种士人型绅商的气质,对基督教抱有宽容的态度,在“传教”的观念上并非一般的见解,所以在他所发表的四篇《传教》的文章,是代晚清“绅商”对传教的正确思想。郑观应主张七教合一,筹建“七教修真院”,以达七教能统一,万众源古今。^⑬在给伍廷芳的诗有云:

有时梦游多奇境,此非阳神乃阴神。我倡各教统一议,已蒙上帝准行矣。尚祈各教统一心,协力同心急奋起。大同世界泯战争,民康物阜万国宁。不分畛域无强弱,专崇道德重文明。九老图中是谁大,闻已组织圣教会。道高德重比冲虚,宏开道院福无艾。^⑭

郑观应的思想是由现世而走向出世,认为宗教的合一,才能使人步上大同之境,在宗教的合一里,实现世界大同。

注解:

- ① 厦东元,《郑观应集》,下册(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8年4月),页619-620。
- ② 厦东元,《郑观应集》,(上海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5年11月),页276-277。
- ③ 易惠莉,《郑观应评传》,(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8年12月),页330-340;622-626。
- ④ 同上注270-274。
- ⑤ 章元沅、马敏、朱英,《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学商》,(武汉,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0年6月),页233-258。
- ⑥ 同上注,页246。
- ⑦ 田涛,《中西闻见录》格致汇编影印本序,载《格致汇编》第一册,(南京,南京古旧书店,1992年6月),页4-5。
- ⑧ 同上注②,页6-7。
- ⑨ 同上注③,页472-473。
- ⑩ 邓景滨,《郑观应诗选》(澳门,澳门中华诗词学会,1995年1月)页81页。
- ⑪ 朱维铮,《导言》,载钱钟书《弢园文新编》(香港,三联书店,1998年7月)页1-25。
- ⑫ 同上注①,上册,页61。

- ⑬ 同上注①,页214-217。
- ⑭ 王耿雄,《孙中山与上海》,(上海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1年12月),页9-13。
- ⑮ 李志刚,《容闳与近代中国》,(台北,正中书局,民国70年2月),页7-15。
- ⑯ 同上注②,页5-7。
- ⑰ Yung Wing, "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"。(New York, Henry Holt and Company, 1909)p. 77-78。据郑观应和容闳入宝顺洋行,是由乡亲曾寄圃(Tsang kee Foo)介绍引荐。
- ⑱ 同上注②,页278。
- ⑲ 同上注⑩,页113。
- ⑳ 张去樵,《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》,(台北,经联出版事业公司,民国76年4月),页43。
- ㉑ 同上注⑳,页4-28。
- ㉒ 同上注⑩,页83-84。
- ㉓ E. H. Paterson, "A Hospital for Hong Kong-The 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" p. 13-18。
- ㉔ 黄振权,《香港清季洋务建设运动之关系》,(香港,珠海书院中国文学历史研究所,1980),页125-131。
- ㉕ 同上注⑩,页95-96。
- ㉖ 沈渭滨,《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新资料》,载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(北京,中华书局,1980年8月),页88-94。
- ㉗ 同上注⑲,页90。
- ㉘ 同上注③,页485-488。
- ㉙ 同上注①,上册,《编辑说明》。
- ㉚ 以上所列各目是根据《易言》和《盛世危言》书目所罗列。
- ㉛ 同上注①,上册,页121。
- ㉜ 同上注①,上册,页180。
- ㉝ 同上注①,上册,页405。
- ㉞ 同上注①,上册,页409。
- ㉟ 同上注①,上册,页123。
- ㊱ 同上注①,上册,页181。
- ㊲ 同上注①,上册,页407。
- ㊳ 同上注①,上册,页412。
- ㊴ 同上注①,上册,页411。
- ㊵ 同上注①,上册,页407。
- ㊶ 同上注①,上册,页275、283。
- ㊷ 同上注①,有关郑观应对道教的著作,列入《道术》,页15-169。
- ㊸ 同上注①,上册,页1471。
- ㊹ 同上注①,上册,页1472-1473。

(本文作者是香港基督教文化学会会长)